

# 农村社区能力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戚晓明<sup>1</sup> 高昊<sup>2</sup>

(1.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5; 2. 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江苏南京 210002)

**摘要:**传统农村社区多以政府主导下自上而下的外源式发展为主,因而往往忽略了社区内在的能力建设。实际上,社区能力建设将对社区发展和农村居民个人福祉产生一定影响。以皖西南农村社区为例,通过因子分析法和建立有序回归模型考察农村社区能力构成及其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现阶段皖西南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农村社区能力要素主要包括农村社区组织能力、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农村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的能力;其中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最大,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的能力次之,社区组织能力的影 响最小。因而要大力推进村民自治,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尤其是良好的人际信任、邻里互助关系,进一步提高农村社区现有组织的组织管理能力。

**关键词:**社区能力;农村;幸福感;农村居民;社区

**中图分类号:**C912.82;D4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7)05-0075-06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是指个体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做出的情感性和认知性评价的一种心理感受<sup>[1]</sup>。追求幸福是每个个体及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中叶的西方。到目前为止,主观幸福感已经成为国际国内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关注的热点。已有的研究在探讨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时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健康、公平、自由、收入、就业等方面<sup>[2]</sup>,很少有研究考虑到社区层面的因素。而实际上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其生活所在地都是社区,社区是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讲,社区的发展状况将会对个人的幸福感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利用皖西南农村的实证调研数据,从社区层面探讨农村社区能力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旨在为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推进农村社区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 1. 社区能力与居民幸福感

我国传统的农村社区在发展中较多地强调政府

主导下自上而下的外源式发展,而往往忽略社区内部的能力建设,这也导致社区自治性较低,影响了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由此有学者提出从社区能力构建的角度实现农村社区发展的范式转换<sup>[3]</sup>。实际上,社区能力的概念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西方出现,社区能力建设作为反社会排斥的一个政策手段,通常强调个人参与、集体动员等。到了 90 年代,各国在谋求社会发展中强调以社区能力建设为重点,注重基层实践中的民众参与<sup>[4]</sup>。目前社区能力的研究包括将社区能力看作是组织和个体所具有的资源、关系网络及技术等资源导向视角和将社区能力作为解决问题和需求时采取集体行动的过程视角<sup>[5]</sup>。而大多数学者包括 Goodman<sup>[6]</sup>、Chaskin<sup>[7]</sup>、Beckley<sup>[8]</sup>、Labonte<sup>[9]</sup>等都是从过程视角出发对社区能力作了理论探索。国内目前探讨社区能力的研究并不多,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定性的角度对社区能力建设的问题进行探讨。仅有少数学者运用定量方法进行分析,例如徐延辉等<sup>[10]</sup>在借鉴 Labonte 等关于社区能力定义的基础上对厦门等地城市社区能力进行了测量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社区能力主要是社区组

收稿日期:2017-05-25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特色智库项目(SKZK2015007);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SHD019);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SKPT2014013)

作者简介:戚晓明(1981—),女,江苏盐城人,副教授,博士,从事农村社会学、社区研究。

织服务能力、社区组织参与能力、社区培育社会资本的能力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孟祥斐<sup>[11]</sup>同样借鉴了 Labonte 等的定义论证了深圳和厦门地区社区能力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还有的学者并没有直接从社区能力层面分析,而是在社区发展的具体方面论述了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例如陈前恒等<sup>[12]</sup>通过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调查发现村庄直接民主能够显著增加居民的幸福。为了充实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尝试提出研究假说一:农村社区能力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 2. 人口学要素与居民幸福感

目前国内外关于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多,大多数学者都对人口学因素诸如性别、年龄、婚姻状态、教育程度、收入等作了探讨。首先,性别会影响到幸福感。Graham 等<sup>[13]</sup>在探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之间居民幸福感差异时发现在控制了年龄、收入和教育程度后女性的幸福感高于男性,但是在低收入国家也存在例外。黄嘉文在分析 200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后也得出了女性幸福感高于男性的相似结论<sup>[14]</sup>。边燕杰等则认为由于社会对男女角色的定位、标准不同<sup>[15]</sup>,女性比男性更易满足,幸福感更高。第二,年龄对幸福感也有影响。从理论上讲,年龄越小,其所受的生活压力越小,幸福感越强;人到中年后,家庭、事业等各方面压力接踵而来,幸福感容易降低;年老退休后生活变得简单,压力减小,幸福感易于上升。学者们的实证研究也论证了这一观点,即年龄与幸福感呈 U 型关系<sup>[16-18]</sup>。第三,婚姻状态往往影响幸福感。从功能上来讲,婚姻可以为个人提供情感支持,良好的婚姻状况有利于幸福感的提升。研究也表明,婚姻状态较好的人往往比婚姻状态较差的人更幸福<sup>[19]</sup>。第四,收入会影响幸福感。从理论上讲,收入给人们提供了经济保障,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从而提升幸福感。邢占军<sup>[20]</sup>对山东省连续 7 年的调查结果也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点。第五,教育程度也会影响幸福感。从理论上讲,教育程度有利于个人的职业、地位、财富等资源的获得,从而对幸福感的提升产生积极的作用。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得出教育程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方向并没有统一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说二:人口学要素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 二、研究设计

### 1. 主要变量

#### (1) 社区能力

如前所述,国外关于社区能力的界定有不同的

理论视角。在 Labonte 和 Laverack 看来,社区能力就是一个通过增强社区群体能力以界定、评估、分析和解决那些社区成员所关心的问题的过程<sup>[21]</sup>。他们认为,社区能力的内涵包括 9 个方面:参与、社区领袖、组织结构、问题评估、资源动员、批判性反思、与居民的联系、外部组织的角色、社区计划管理。本文在参考 Labonte 等社区能力界定以及国内学者黄云凌等在分析城市社区能力时关于社区能力界定的基础上,结合农村社区的特点,建立农村社区能力的测量指标。如表 1 所示,共有 17 个指标,测量时根据李克特 5 点量表,1—5 分别代表“很不符合”“不符合”“一般”“符合”“非常符合”。

表 1 农村社区<sup>①</sup>能力测量指标

测量维度	具体指标
参与	村民有很多参与到村公共事务决策的机会;村经常自己创办和组织一些活动;村民经常参与村组织的活动。
社区领袖	村经常在村民中培养一些负责日常事务的领导者。
组织结构	村有完善的规章制度,村组织工作效率很高;村民有矛盾的话,村组织都能化解。
问题评估	村能够有意识地培养居民解决问题、寻找资源的能力。
资源动员	村组织能利用本村内部资源(人力、物力、财力)促进村发展;本村能争取到很多村以外的资源促进本村发展;本村能提供多种公共设施和服务满足村民需求。
批判性反思	村组织能够通过反思和总结经验来促进本村发展。
与居民的联系	村民是值得信任的;邻里之间经常互相帮助;本村能接纳外来不同背景的人。
外部组织的角色	本村能与村外部组织合作共同促进本村发展。
社区计划管理	本村有明确的、大家认可的发展目标和计划;村组织能通过各种手段和计划指导本村发展。

### (2) 幸福感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感受,它具有明确的测量指标。心理学上认为,幸福感的测量指标可以包括 3 个方面:一是认知评价,是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即生活满意度<sup>[22]</sup>;二是积极情感,主要指精神振奋、高兴、愉快等情绪体验;三是消极情感,指悲伤、焦虑、难受、孤独、抑郁等情绪体验。其中,认知评价是独立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sup>[23]</sup>,它能有效地测量出幸福感的状况,是最关键的指标。本文测量农村居民幸福感时就使用生活满意度这一评价指标,采用李克特 5 分量表,1—5 分别代表“很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很满意”<sup>[24]</sup><sup>250</sup>。

###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先采取因子分析法对农村社区能力进行

①本文中的农村社区是较为宽泛的概念,包括了国家进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农村社区,也包括传统的村落社区。在下文统计表格中为了简便,并与城市社区区别,直接用“村”来表述。

降维,分析出农村社区能力的主要构成因子,然后利用有序回归模型,以降维后的社区能力因子作为自变量、农村居民幸福感作为因变量、人口学要素作为其他控制变量测量出社区能力要素对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 (1)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法是可以将数量较多且复杂的变量进行综合、合并为数量较少的几个综合因子,并通过这几个因子来反映原有变量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分析方法。其数学模型可以表达为:

$$X_i = a_{i1}F_1 + a_{i2}F_2 + \dots + a_{ik}F_k + \mu$$

$$(i = 1, 2, \dots, p; j = 1, 2, \dots, k)$$

其中, $X_i$ 是原有的变量, $F_j$ 是公共因子,共有  $k$  个公共因子; $a_{ij}$ 是表示原有变量和因子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因子载荷; $\mu$ 表示原有变量不能被因子所解释的部分。

### (2) 有序回归模型

如上文所述,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以生活满意度为指标来测量,该指标是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逐步递进的 5 分变量,因而这里采用有序回归模型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分析。数学模型为:

$$\ln\left(\frac{P(Y_k \leq m)}{P(Y_k > m)}\right) = \beta_0 + \sum_{j=1}^n \beta_j \chi_{ij}$$

其中, $m$ 表示因变量的赋值(1—5 分别代表“很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很满意”); $\beta_0$ 是常数项; $\beta_j$ 是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反映了社区能力要素、人口学要素对幸福感影响的程度和方向。

### 3.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5 年 7—10 月在皖西南地区(主要是安庆)进行的农村调研。安徽省安庆市主要由 4 个市辖区、7 个县和 1 个县级市构成。本次调研主要以怀宁县、太湖县、枞阳县、望江县、潜山县、宿松县、岳西县 7 个县为主,从每个县随机抽取 1 个乡,每个乡随机抽取 2 个村,每个村发

放 50 份问卷,调查对象为农村居民。共发放问卷 7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56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79.43%。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如表 2。

表 2 样本的人口学特征(N=556)

分类变量	变量赋值	比例/%	连续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男	51.1	年龄	48.430	16.762
	女	48.9			
教育程度	本科及以上	5.0	收入对数	9.337	0.803
	大专	2.9			
	高中或中专	12.9			
	初中	25.9			
小学及以下	小学及以下	53.2	婚姻状况		
	未婚	12.9			
	丧偶	8.6			
	离异	1.4			
	已婚	77.1			

注:收入对数这里是取的样本人均年收入的対数

## 三、数据处理与分析

### 1. 农村社区能力的因子分析

如上所述,农村社区能力这一概念被操作化为 9 个方面共 17 个指标,因而在分析农村社区能力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前必须对借助降维工具对数据进行处理。这里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农村社区能力进行因子分析。KMO 检验值为 0.769, Bartlett 球形检验  $P$  值为 0.000, Cronbach's  $\alpha$  系数 0.916, 问卷可靠性较高,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经过主成分分析法,4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共因子( $F_1$ 、 $F_2$ 、 $F_3$ 、 $F_4$ )被提取出来。公共因子总方差解释率达到 66.560%,表明公共因子能够较好地解释原始变量的信息。其中, $F_1$ 的方差解释率为 43.877%,是 4 个因子中最重要的影响因子; $F_2$ 的方差解释率为 9.807%, $F_3$ 的为 6.987%, $F_4$ 的为 5.888%,影响力依次递减。

运用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载

表 3 旋转成分矩阵

原始变量	$F_1$	$F_2$	$F_3$	$F_4$	共同度
村委的工作效率很高 $X_1$	0.827	0.200	0.198	0.078	0.769
村组织通过反思和总结经验促进本村发展 $X_2$	0.811	0.171	0.036	0.141	0.708
村组织利用本村内部资源促进村的发展 $X_3$	0.752	0.330	-0.010	0.270	0.748
本村有明确的发展目标 $X_4$	0.719	0.254	0.091	0.186	0.624
村组织通过各种手段和计划指导本村发展 $X_5$	0.669	0.297	0.082	0.298	0.631
村委组织能化解村民矛盾 $X_6$	0.646	0.225	0.324	0.179	0.605
村培养负责日常事务的牵头者 $X_7$	0.547	0.358	0.335	-0.048	0.542
村经常自己创办和组织一些活动 $X_8$	0.322	0.774	0.110	0.056	0.718
村民经常参与村组织的活动 $X_9$	0.352	0.726	0.097	-0.134	0.679
本村能提供多种公共设施和服务满足村民需求 $X_{10}$	0.090	0.711	-0.118	0.358	0.656
村有意识地培养居民解决问题寻找资源的能力 $X_{11}$	0.404	0.615	0.340	0.089	0.665
村民参与到公共事务决策的机会 $X_{12}$	0.475	0.564	0.094	0.052	0.555
村民是值得信任的 $X_{13}$	0.060	0.151	0.849	0.076	0.753
邻里之间互相帮助 $X_{14}$	0.214	-0.020	0.823	0.191	0.760
本村能接纳不同背景的人 $X_{15}$	0.106	-0.218	0.285	0.736	0.682
本村争取村外部资源促进本村发展 $X_{16}$	0.314	0.399	0.050	0.614	0.637
村能与村外部组织合作促发展 $X_{17}$	0.391	0.345	0.073	0.552	0.582

荷矩阵进行旋转,旋转在 9 次迭代后收敛。从表 3 可以看出,公共因子  $F_1$  在村委的工作效率高、村组织能通过反思和总结经验促进本村发展、村组织能利用本村内部资源促进村的发展、村有明确的发展目标、村组织通过各种手段和计划指导本村发展、村委能化解村民矛盾、村能培养负责日常事务的牵头者这 7 个变量上的载荷系数较高,在此将其命名为社区组织能力;公共因子  $F_2$  在村经常创办和组织一些活动、村民经常参与村组织的活动、村能提供多种公共设施和服务满足村民需求、村有意识地培养居民解决问题和寻找资源的能力、村民有很多参与到村公共事务决策的机会这 5 个变量上的载荷系数较高,将其命名为社区自治能力;公共因子  $F_3$  在村民是值得信任的、邻里之间经常互相帮助这 2 个变量上的载荷系数较高,将其命名为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的能力;公共因子  $F_4$  在本村能接纳外来不同背景的人、村能争取外部资源促进本村发展、村能利用村外部组织资源的能力这 3 个变量上的载荷系数较高,将其命名为社区培育外部社会资本的能力。所有变量的共同度及公共因子对变量的载荷均大于 0.5,显示出良好的区别效度和聚合效度<sup>[24]252</sup>。

表 4 为因子得分系数矩阵,17 个原始变量被 4 个公共因子提取的情况一目了然。从综合排名中可以看出原始变量对农村社区能力的作用大小。根据因子得分,4 个公共因子的评价模型分别为:

$$F_1 = 0.827X_1 + 0.811X_2 + 0.752X_3 + 0.719X_4 + 0.669X_5 + 0.646X_6 + 0.547X_7 + 0.322X_8 + 0.352X_9 + 0.090X_{10} + 0.404X_{11} + 0.475X_{12} + 0.060X_{13} + 0.214X_{14} + 0.106X_{15} + 0.314X_{16} + 0.391X_{17}$$

$$F_2 = 0.200X_1 + 0.171X_2 + 0.330X_3 + 0.254X_4 + 0.297X_5 + 0.225X_6 + 0.358X_7 + 0.774X_8 + 0.726X_9 +$$

$$0.711X_{10} + 0.615X_{11} + 0.564X_{12} + 0.151X_{13} - 0.020X_{14} - 0.218X_{15} + 0.399X_{16} + 0.345X_{17}$$

$$F_3 = 0.198X_1 + 0.036X_2 - 0.010X_3 + 0.091X_4 + 0.082X_5 + 0.324X_6 + 0.335X_7 + 0.110X_8 + 0.097X_9 - 0.118X_{10} + 0.340X_{11} + 0.094X_{12} + 0.849X_{13} + 0.823X_{14} + 0.285X_{15} + 0.050X_{16} + 0.073X_{17}$$

$$F_4 = 0.078X_1 + 0.141X_2 + 0.270X_3 + 0.186X_4 + 0.298X_5 + 0.179X_6 - 0.048X_7 + 0.056X_8 - 0.134X_9 + 0.358X_{10} + 0.089X_{11} + 0.052X_{12} + 0.076X_{13} + 0.191X_{14} + 0.736X_{15} + 0.614X_{16} + 0.552X_{17}$$

## 2. 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有序回归分析

如上文所述,本文在测量农村居民幸福感时用的是生活满意度这一指标,并采取李克特 5 分量表,1—5 分代表了满意度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的逐步提升。从调查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可知,皖西南农村居民的幸福感的均值为 3.075,这说明现阶段皖西南农村居民的幸福感的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在此基础上,本文以社区能力(社区组织能力、社区自治能力、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的能力、社区培育外部社会资本的能力)作为自变量,以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建立这些变量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有序回归模型。模型的整体拟合信息检验值为 0.000,小于 0.05,说明模型有效。在拟合优度方面,模型的 Pearson 值为 0.769,Deviance 值为 1.000,都大于 0.05,模型拟合良好。在伪  $R$  方系数方面,Cox and Snell 值为 0.276,Nagelkerke 值为 0.312,McFadden 值为 0.149,均大于 0.05,说明模型有一定的预测性。回归结果见表 5。

### (1) 社区能力要素的作用

表 5 的回归结果表明,社区能力要素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具体说来,社区组织能

表 4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原始变量	$F_1$	$F_2$	$F_3$	$F_4$	$F_{综}$	排名
村委的工作效率很高 $X_1$	0.827	0.200	0.198	0.078	0.602	1
村组织通过反思和总结经验促进本村发展 $X_2$	0.811	0.171	0.036	0.141	0.576	2
村组织利用本村内部资源促进村的发展 $X_3$	0.752	0.330	-0.010	0.270	0.567	3
本村有明确的发展目标 $X_4$	0.719	0.254	0.091	0.186	0.537	4
村组织通过各种手段和计划指导本村发展 $X_5$	0.669	0.297	0.082	0.298	0.520	5
村委组织能化解村民矛盾 $X_6$	0.646	0.225	0.324	0.179	0.509	6
村培养负责日常事务的牵头者 $X_7$	0.547	0.358	0.335	-0.048	0.444	7
村经常自己创办和组织一些活动 $X_8$	0.322	0.774	0.110	0.056	0.343	11
村民经常参与村组织的活动 $X_9$	0.352	0.726	0.097	-0.134	0.337	12
本村能提供多种公共设施和服务满足村民需求 $X_{10}$	0.090	0.711	-0.118	0.358	0.183	15
村有意识地培养居民解决问题寻找资源的能力 $X_{11}$	0.404	0.615	0.340	0.089	0.400	9
村民参与到公共事务决策的机会 $X_{12}$	0.475	0.564	0.094	0.052	0.410	8
村民是值得信任的 $X_{13}$	0.060	0.151	0.849	0.076	0.157	16
邻里之间互相帮助 $X_{14}$	0.214	-0.020	0.823	0.191	0.241	14
本村能接纳不同背景的人 $X_{15}$	0.106	-0.218	0.285	0.736	0.133	17
本村争取村外部资源促进本村发展 $X_{16}$	0.314	0.399	0.050	0.614	0.325	13
村能与村外部组织合作促发展 $X_{17}$	0.391	0.345	0.073	0.552	0.365	10

表5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估计	显著性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阈值	[幸福感=1.00]	-2.372 *	0.091	-5.122	0.378
	[幸福感=2.00]	-1.141	0.405	-3.828	1.546
	[幸福感=3.00]	0.049	0.971	-2.635	2.733
	[幸福感=4.00]	2.924 **	0.035	0.204	5.644
位置	[性别=1.00]	-0.224 **	0.043	-0.553	0.106
	[性别=2.00]	0 <sup>a</sup>			
	年龄	-0.066 *	0.059	-0.134	0.003
	年龄平方/100	0.058 *	0.088	-0.009	0.125
	收入对数	0.189 *	0.059	-0.007	0.386
	[婚姻状况=1.00]	1.550	0.143	0.052	3.065
	[婚姻状况=2.00]	0.025	0.940	-0.616	0.666
	[婚姻状况=3.00]	-0.993 **	0.002	-1.614	-0.373
	[婚姻状况=4.00]	0 <sup>a</sup>			
	[教育程度=1.00]	0.770 *	0.077	-0.085	1.626
	[教育程度=2.00]	1.392 ***	0.000	0.724	2.059
	[教育程度=3.00]	0.463 **	0.020	0.071	0.854
	[教育程度=4.00]	-0.037	0.937	-0.965	0.890
	[教育程度=5.00]	0 <sup>a</sup>			
	社区组织能力	0.061 **	0.046	-0.082	0.205
	社区自治能力	0.454 ***	0.000	0.290	0.617
	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的能力	0.088 ***	0.001	-0.053	0.229
社区培育外部社会资本的能力	0.086	0.231	-0.055	0.227	

注：\*、\*\*、\*\*\* 分别表示 10%、5%、1% 的置信水平

力的偏回归系数为 0.061,  $\exp(0.061)$  的值为 1.063, 表明随着社区组织能力的提高, 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将提升, 即社区组织能力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区组织能力每提高 1 分, 农村居民幸福感将会提升 0.063 分。社区自治能力的偏回归系数为 0.454,  $\exp(0.454)$  的值为 1.575, 表明随着社区自治能力的提高, 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将提升, 即社区自治能力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区自治能力每提高 1 分, 农村居民幸福感将会提升 0.575 分。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能力的偏回归系数为 0.088,  $\exp(0.088)$  的值为 1.092, 这表明随着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的提, 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将提升, 即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每提高 1 分, 农村居民幸福感将会提升 0.092 分。社区培育外部社会资本的能力对居民幸福感并无显著影响。综合看来, 在社区能力要素中, 社区自治能力对幸福感的影响最大, 其次是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的能力, 再者是社区组织能力。

## (2) 其他因素的作用

回归结果表明, 以女性作为参照组, 男性的偏回归系数为 -0.224, 这说明男性的幸福感显著比女性的幸福感低, 这与目前国内外学者如 Graham、边燕杰、黄嘉文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年龄与幸福感的

一次项系数为 -0.066, 二次项系数为 0.058, 表明年龄与幸福感呈正 U 型关系, 这也与国内外学者如 Gerdtam、Blanchflower、徐仲安的研究保持一致。收入对数的偏回归系数为 0.058, 收入对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这与我国学者邢占军的研究较为一致。在婚姻状况中, 离异的偏回归系数为 -0.993, 在 5% 的统计水平上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其参照组为已婚, 离异人群的幸福感受显著低于已婚人群的幸福感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一些学者如 Ben-Zur 的观点。在教育程度方面, 参照组为小学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大专、高中或中专分别在 10%、1%、5% 的统计水平上对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 则本科及以上、大专、高中或中专学历的人幸福感高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人。目前学术界关于此并未有统一的认识。

##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因子分析法和建立有序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社区能力要素的构成及其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第一, 现阶段皖西南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并不高, 处于中等。第二, 农村社区能力要素主要包括农村社区组织能力、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农村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的能力。第三, 社区组织能力、社区自治能力、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的能力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 以社区自治能力的影响最大, 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的能力次之, 社区组织能力的影响最小。此外, 性别、年龄、收入、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因素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受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农村社区是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上述研究结论表明, 农村社区能力建设对农村居民福祉具有重要影响。无论是从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受还是从提高农村社区能力的角度出发, 今后的农村社区发展都应从以下 3 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一是大力推进农村社区的村民自治。完善农村社区现有的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 增加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渠道和途径; 健全村务公开的监督机制, 实现民主管理; 组织各种活动, 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二是大力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在培育社区内部社会资本方面, 可以利用农村社区各种正式组织(如村委会、村民小组等)或者非正式组织(如妇女协会、老年人社团等)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教文卫活动以加强村民的相互交流和联系, 以形成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守望相助、团结友爱的良好社区氛围及人际信任关系。在培育社区外部社会资本方

面则应加强本社区与社区以外的组织、团体、政府部门等之间的联系。三是进一步提高农村社区现有组织的组织管理能力。村委会目前仍是农村社区最主要的组织,承担着衔接政府与村民的“中间人”的角色。村委会不仅要发挥自治性的功能,也要发挥一定的组织管理功能<sup>[25]</sup>。在涉及村民公共利益、切身利益的事项上村委会要起到牵头作用,组织村民共同协商解决。在各种居民纠纷调解、信访化解方面村委会往往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村委会还要能够充分利用村内外各种资源促进本地区的发展。

此外,农村社区可以学习城市社区,引入专业的社区社会工作组织、人才和方法,通过充分了解居民需求,运用社会工作的赋权使能等手段改变现有的社区权力结构,将村民纳入农村社区事务的共治理中来。当然,这需要政府引入第三方专业的组织<sup>[26]</sup>、团体介入到农村社区建设中来,为农村社区注入新鲜的血液,在农村社区形成官民合作、多元共治的局面。

#### 参考文献:

[ 1 ] 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 [ J ]. Psychology Bulletin, 1984, 95(3) : 542-575.

[ 2 ] 周春平. 收入、基层民主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实证研究——来自江苏 1863 个样本的证据 [ J ]. 人口与发展, 2015(1) : 59-67.

[ 3 ] 刘宝. 农村社区建设的范式转换与实践路径——基于社区能力构建的视角 [ J ].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6) : 179-184.

[ 4 ] SEN A K. Beyond the crisi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Asia [ C ] //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1999: 15-37.

[ 5 ] MANCINI J A, BOWEN G L, MARTIN J A.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a conceptual linchpin in examining families in the context of communities [ J ]. Family Relations, 2005, 54(5) : 570-582.

[ 6 ] GOODMAN R, SPEERS M, MCLEROY K, et al. Identifying and defining the dimensions of community capacity to provide a basis for measurement [ J ]. Health Education and Behaviour, 1998(3) : 258-278.

[ 7 ] CHASKIN R J, BROWN P, VENKATESH S, et al. Building community capacity [ M ].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2001: 14-150.

[ 8 ] BECKLEY T, NADEAU S, WALL E, et al. Multiple capacities, multiple outcomes: delving deeper into the meaning of community capacity [ J ]. Journal of Rural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04(3) : 56-75.

[ 9 ] LABONTE R, LAVERACK G. Capacity building in health promotion, part 1: for whom and for what purpose [ J ]. Critical Public Health, 2001(2) : 129-138.

[ 10 ] 徐延辉, 兰林火. 社区能力、社区效能感与城市居民的幸福——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能路径研究 [ J ].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11) : 131-142.

[ 11 ] 孟祥斐. 政府绩效、社区能力与居民幸福感——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 J ]. 领导科学, 2015(8) : 8-10.

[ 12 ] 陈前恒, 职嘉男. 村庄直接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 J ]. 中国农村观察, 2014(6) : 59-70.

[ 13 ] GRAHAM C, CHATTOPADHYAY S. Gender and well-being around the world [ J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appiness & Development, 2013, 1(2) : 2-14.

[ 14 ] 黄嘉文.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 J ]. 社会, 2013(5) : 181-203.

[ 15 ] 边燕杰, 肖阳. 中英居民主观幸福感比较研究 [ J ]. 社会学研究, 2014(2) : 22-42.

[ 16 ] GERDTHAM U, JOHANNESSON,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ppiness, health,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results based on swedish microdata [ J ].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01, 30(3) : 553-557.

[ 17 ] BLANCHFLOWER D G, OSWALD A J.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 J ].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7) : 1359-1386.

[ 18 ] 徐仲安, 靳共元, 张晓林, 等. 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四川省震后灾区与非灾区的对比 [ J ]. 中国农村观察, 2013(4) : 72-85.

[ 19 ] BEN-ZUR H. Loneliness, optimism, and well-being among married, divorced, and widowed individuals [ J ].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2, 146(1-2) : 23-36.

[ 20 ] 邢占军. 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 J ]. 社会学研究, 2011(1) : 196-219.

[ 21 ] 黄云凌, 武艳华, 徐延辉. 社区能力及其测量——以深圳市为例 [ J ]. 城市问题, 2013(3) : 20-27.

[ 22 ] 陈姝娟, 周爱保. 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 J ].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03(3) : 214-217.

[ 23 ] 吴明霞. 30 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 [ J ]. 心理学动态, 2000(4) : 23-28.

[ 24 ] 戚晓明. 基于因子分析的农村义务教育家长满意度研究 [ J ]. 江苏社会科学, 2015(5) : 248-254.

[ 25 ] 何雪松. 基层社区治理与社会工作的专业回应 [ J ].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6(4) : 109-112.

[ 26 ] 杨贵华. 民办非营利社区服务组织的培育发展及其监管 [ J ].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2) : 109-113.

(责任编辑:吴玲)